



妙齡女警

妙龄女警

作者：[苏]

米赫耶夫

译者：

吕同达

责任编辑:杨雪平

封面设计:姜 录

妙龄女警

[苏]M·M·米赫耶夫

郝文 吉同达 译

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

(哈尔滨市道外公裕街10号)

第十一印刷厂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 1/32·印张12.25 字数20,000

年10月第1版 1991年10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1-16,400

'17-0569-9/1·569 定价:5.00元

赴新岗位

乘飞机去新西伯利亚市仅需要三个小时，坐火车却要走两昼夜。

我决定搭乘火车前往。

就要离开故乡了。我曾在这里出生、长大、读书、恋爱、憧憬着建立家庭……

命运之神突然将诸多不幸倾泄到我的头上，因此我渴望着远走他乡——在那里不会触景生情，没有人认识我，我也不认识任何人。

26岁的人陡然迁徙异乡，一改生活习惯和熟悉的环境，确非易事。因此，我非常需要这不必劳心费神的两昼夜旅途生活，仿佛潜水员从深海底浮上水面稍事休息。

至于说到了新西伯利亚将交付我什么任务——对此，我一无可知。

这趟远差属秘密性质。斯维里多夫中校说，他亲自向新西伯利亚反盗窃社会主义财产和投机行为局推荐了我，具体任务到达工作岗位之后才能得知。我把写给母亲的信交给中校，往常一样，没封口，也没写收信人地址，只写了犯人号码。然

去取证件。

拿到一份新的身份证，用的是结婚前的姓——格罗舍：叶夫根尼娅·谢尔盖耶夫娜·格罗舍娃，商业工作者，在此之前是商学院三年级学生。

身份证和商学院的证明是真实的。但是，劳动手册上的记载却是虚构，说我最近三年在一家军人商店做商品计价员。事实上这三年我是在警官学校学习的。个人简历看上去似乎也很奇特：“父亲——民警中尉，执行公务时以身殉职；母亲——商业工作者，根据《补充刑法》第九十三款被判处八年劳改……”

我进商学院，是由于母亲一再坚持，她当时是一家百货公司的部主任。尽管我中学毕业时荣获金质奖章，但我对任何科目都没有特别的爱好和专长，因而进什么学校对我来说都无所谓。我对父亲的记忆十分模糊，他牺牲的时候我刚刚上小学。

我在寡母膝前长大，一根独苗苗，娇生惯养。孩童时的我自私自利，无忧无虑，学习成绩满堂红，从不为家务操劳。

母亲改嫁了……

我喜欢继父。他聪明、漂亮，在商业局工作。我们很快搬进了新居，购置了进口家具，紧接着又有了别墅、伏尔加小轿车。时髦的服饰更是随要随买。如果我稍微动动脑子，立刻就会明白：我们生活得过于阔绰，来路显然不地道。但当时我迷恋着业余学生剧团，经常在俱乐部舞台上演出，而且似乎小有成就，以致于无暇他顾……

清晨6点钟，警车突然开到我们家门口。于是，懵懂中的我，一个人孤零零地被抛弃在住宅里。晚上，侦查员传讯我，那

时我才恍然大悟：我继父是个什么东西，我母亲变成了什么人。

我再不肯回到商学院——无颜去见昔日的同窗。我是盗窃犯的同伙，一度靠盗得的财物生活。尽管我并不知情，但这不成其为辩护的理由。我明白，我无权再去商业系统学习或工作。为了补偿自觉不自觉犯下的罪过，我生活中只有一条路……斯维里多夫中校缅怀着我的生父，接受我进了警官学校。

不久前我刚从警官学校毕业，这次远差是我的第一次重大任务……

谁也没到车站为我送行——我没把出发的时间告诉任何人。最近我一直穿警服，但乘火车要着便衣。我把全部行装塞进了一个旅行包和一只皮箱，既没带书，也没带那些使我触物伤情的小玩艺儿。我最喜爱的一只绒布小熊——米基·毛斯兀自呆坐在梳妆台的镜子前。米基·毛斯并没有罪过，但它是尔送我的礼物，此时我最不想记起的正是他。

寒秋九月，独赴西伯利亚。我觉得乘坐火车穿尼龙短上衣和黑色紧士裤最方便。紧士裤还是学生时代买的，压在一只旧皮箱底下。在皮箱底下，我不期翻到了那只法兰绒小包裹，一阵忧伤袭上心头……假如有个孩子，或许一切另是一番景象，然而我的儿子不肯活着降生到人间。

我给伊戈尔留了个便条。眼下他住在自己父母家，但户口仍然留在我这里——乌里茨基大街50号。我告诉他：住宅和一切家用什物他可以自由支配。便条没署名，只把房门钥匙压在上面。一把麻麻的美国锁钥匙。

在车厢里，我把自己的下铺让给一位比我稍大的女旅伴。

她人很胖，又穿着窄小的迷你裙，爬到上铺去委实不易。更何况对面的下铺是一位上年纪的男人，和他同行的女儿——一个高年级学生——毫不费力地爬上了上铺。

夜里久久不能成眠。

车窗外是漆黑的秋夜，秋雨洒满了窗玻璃。火车哐唧唧地响着，把我带往不可知的未来……但愿那未来比过去对我宽厚些。

当我朦胧入睡之际，险些从铺架上摔下来。仿佛我正躺在自家的床铺上，身旁睡着伊戈尔。我离他越来越远，越来越远

.....

二

天亮以后我才入睡，这一睡竟是酣梦悠悠，甚至没听到包厢的旅客的更迭。我睁开眼睛，久久地呆望着挂在头顶上的行李架。蓦地，我感到有一双眼睛在凝视着我。

我迅速转过头去。

对面上铺上已不是昨天那个高年级女学生，而是一位身着绿色军衬衣的年轻男子。那男子没来得及把目光调开，一时非常窘迫，这使我很开心——我一向喜欢男人的腼腆；那种被捧上天的男子的刚毅果敢，从来没给我留下过好印象。我认为，男人有足够的其他方式来证明自己的阳刚气度。

衣帽钩上挂着一件军人制服和一顶大沿帽，帽子上缀着银光闪闪的小翅膀，这说明，我的新邻居与“蓝天”事业有关。

包厢里四号下铺换上了一位寡言少语的老头儿。

飞行员的名字叫廖沙，我们在车厢走廊里谈得很投机。早饭后，他借给我一本很有趣的描写物理学家的书——《开玩笑的人们》，自己却跑到隔壁车厢去打扑克。我祝他输牌，他回答说，他从来就没赢过。不知为什么，这种反语祝愿对他总不灵验——爱情中同样不走运。

度过了长途旅行的平凡的一天：轻声慢语的交谈，随便浏览书刊，排队洗漱，列车员吸尘——嘴里不住地埋怨旅客，喝茶，小卖部服务员推来露馅小圆饼——我一向喜欢买这种小饼吃，在大街上现买现吃，随便躲在一个角落里，馅饼下垫张小纸，滚热的馅汁烫着手指。

傍晚，列车停靠在一个大站。列车员宣布停车10分钟。可以走出车厢舒展一下筋骨了，同时还可以去小书亭瞧瞧。站台上，人们蜂拥着挤上开往郊区的电动火车，我好不容易才挤进站房。“联盟书店”书亭在大厅的一角，紧靠通往车站饭店的出口。

我正在柜台前细看摆着的书刊，饭店的大门突然洞开，一个醉汉连滚带爬地闯进了大厅，随后从饭店里传来一声慢悠悠的、沙哑的男中音：“花园里静悄悄……”

“瞧我们这里多热闹，”女售货员叹了口气说。“三号发工资，到时候就再也不会静悄悄啦……”

饭店里传来打碎玻璃的声音，歌声嘎然而止。门口出现了一个饭店女招待，胸前系着小巧玲珑的围裙，头上扎着花边头巾。

“没见到我们的瓦列拉吗？”她问。

“你是说那个民警吧？”

“当然是他。”

“刚才还在这儿。”

“咳，需要的时候总是找不到他。”

“你们什么时候不需要？要他一天到晚守着你们才行？你们少灌汉子们点儿酒不就得了。就顾着自己完成指标。”

女招待慢吞吞地返回饭店。吵闹声依然没有平息。忽听哗啦一声响，紧接着是一个女人的惊叫声：“根纳，根纳，你要干什么？！”一记响亮的耳光——喊声陡然停止。

“天哪！”女售货员惊呼。“他们又在闹什么？”

出于种种原因，我本不该介入这场饭店酗酒事件。但我毕竟是个民警中尉，而那边有人正在毒打一个女人。

闹事的那张餐桌紧靠门口。说时迟，那时快——我两步跳了过去，紧紧抓住举在空中的一只手。那只手正握着一只低度酒瓶，又重又长，好象一根木棒。也许那醉汉无意用它打人，只想装装样子吓唬吓唬人；匆忙中来不及细察——我不止一次见过用这种酒瓶一击使人丧命。

那男人手握瓶颈，因此我一把就将瓶子夺了下来。

餐桌旁坐着五、六个人，其中有两位妇女。一个女人死扯着醉汉的衣袖，另一个趴在桌子上，双手捂着脸——看样刚才那一记耳光打在她脸上。

我的干预来得十分突兀，众人转瞬安静下来。

被我夺去酒瓶的那一位也顿息雷霆之怒。

他那双醉醺醺的眼睛依然斜视着。餐桌上摆着许多酒瓶，伸手可取。我留神观察他的动静。他万万没料到，站出来抱不平的竟然是我这样一个黄毛丫头，以致他脸上流露出不知所

措的神情。

愠怒之色消失。我将酒瓶放到桌子上。

“傻帽儿！”我说，“用这样的酒瓶会打死人的。”

后来的事情无需我多管——民警及时赶到了。

民警是个很精干的小伙子，餐厅里打架斗殴对他来说是司空见惯的事。女招待急步迎上去。我悄悄溜到门口。

廖沙焦急万分地等在月台上。

“您到哪儿去啦？让我好找！”他嚷道。“火车就要开了。”

他抓起我的手，我们迅速顺站台朝前跑去。列车员正打算关门，我俩飞身跳进车厢。

“您怎么会跑到饭店去啦？”廖沙问道。

“想喝一杯。”我回答。

三

我们的列车于清晨抵达新西伯利亚车站。

廖沙帮我扛着皮箱，我自己背着旅行包。来到宽敞的候车大厅，廖沙不知所措地在我身边踌躇片刻，然后象个真正的男子汉，用力握了握我的手便走掉了。斯维里多夫中校事先和我打过招呼，到站后没有人来迎接我。我把东西塞进行李寄存处的自动箱中，走出大厅，来到车站广场。

车站广场也很宽大，和宽敞的候车大厅十分相称。广场上停着一大片汽车，出租车穿梭般来来往往，电车闪着火花缓缓开动。妇女们在路旁叫卖唐菖蒲、穗醋栗和葵花子。我看到广场对面有一家百货公司和几座自动电话亭。车站正面绿色的

墙壁上镶着一座大钟，指出当地时间。我照壁钟的时间对好自己的手表。百货公司的楼房却是又旧又窄小，我不想买任何东西，仅仅顺着柜台走了一趟，登上二楼，来到服装部。顾客熙熙攘攘，我顿时淹没在人群中。挤来挤去都是些异乡城市陌生的面孔。暂时维系着我和这座城市的只有一个电话号码——临行前斯维里多夫中校交给我的联系电话。

鞋部里挂着一部自动电话机，但附近人来人往。于是我又回到大街上去找电话亭。接电话的正是我要找的人——普里霍季科上校。我告诉他我从什么地方来。上校沉默片刻，然后请我转打另一个电话，并告诉了新号码。

我身边再没有两戈比硬币。只好往电话机里塞了个10戈比硬币。这一次回话的不再是上校，而是一个甜美、温和、不带官腔的嗓音。

“您现在在哪儿？……行李多吗？……那就请您乘电车来吧，除了二路，随便坐哪一路都可以，在‘马雅可夫斯基电影院’车站下车。然后顺电车开走的方向朝前走，您会看到一座玫瑰色五层楼房，顶上有个钟楼，一层有家‘美食店’。人们称这座楼房是‘在钟下的房子’。请进楼角上那个单元。上到三层……”

我遵嘱来到约定地点。

我刚刚按动门铃，房门便应声打开了。一位身穿绉巴巴灰夹克的男人请我进去。他探出头去向走廊里张望了一下，随手关好房门。

他就是我在电话里听到的那个甜美、温和的嗓音的主人。此人的面孔看上去也很和善。

“我是鲍里斯·鲍里索维奇，”他自我介绍。“您是叶夫根尼娅·谢尔盖耶夫娜，我已经知道了。”

我走进房间。一位个子不高的胖上校迎着我站起身来。我报出了姓名。他仔细打量了一番，随后请我坐下。

我觉得未来的上司普里霍季科上校为人严厉，一本正经，因此，一开始我有点局促不安。我未来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。

“您想吃东西吗？”他问。

我回答说，不想吃。

“那就让我们喝茶吧。”

鲍里斯·鲍里索维奇仿佛早有准备，立刻从厨房端来一只摆好茶杯和糕点盒的托盘，佐茶的小吃是馅饼和糖果。虽然我讨厌馅饼，还是知礼地吃了一只，喝了一杯茶，谢绝了第二杯。鲍里斯·鲍里索维奇又为上校端来第二杯，他自己却没喝茶，默默地坐在一旁的小沙发上。上校也一直沉默着。

他们沉默得越久，我的心里越觉得不是滋味儿。

“上校同志，”我开口道，“可以向您请教吗？”

普里霍季科上校将茶杯往旁边一推，两只手交叉着手指放在桌子上，望了我一眼，点头道：

“请讲。”

“根据各种情况看来，”我说道，“您打算……或者至少曾经打算交给我的任务相当重要。然而，我们的初步相识，我的样子……却引起了您的怀疑。”普里霍季科上校点头同意。

“由于个人的原因，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原因，我希望长期留在您这里，在您的处里工作。我不想再回去……再回故

乡。当然，我还不是个有经验的侦查员；我不晓得我将执行一项什么任务，不过，请您相信我，我一定尽力而为。”

说到这里，我顿时觉得羞愧难当；我何必这样激动？何必作这些不得体、不严肃的孩童般许诺？我一时窘迫不堪。

普里霍季科上校莞尔一笑，而我却羞得无地自容。

“您不必激动，叶夫根尼娅·谢尔盖耶夫娜。您说得很好嘛，用不着自悔失言。我的怀疑并非对您不信任。我已经看过对您的推荐材料。您在商学院学习过，又从警官学校毕业，在这个城市里没有人认识您，这一点也很重要。总之，对我们来说，您是再好不过的人选。但是，从档案材料中了解一个人是一码事，而看到这个人站在你面前时就完全是另一码事了。现在我亲眼见到了您，立刻便明白了。有一点我们事先没有考虑到，那就是您的外貌。”

这一来我可彻底慌了神。

“是的，您的外貌，”普里霍季科上校继续说。“您是个年轻漂亮的女人。是个正派女人，您那一身正气，一公里外就能看得出。您将会很困难。比我们拟定计划时想象的困难得多。”

上校起身，并用手势制止了我。我依然坐着。上校手一背，默默地去房间里踱了一圈。

我不理解上校本意何在，求援的目光扫向鲍里斯·鲍里索维奇；然而鲍里斯不置可否，只是微微一笑，微笑中流露出几分赞许。

“您是否登台演过戏？”上校问。“当然是指业余爱好。比方说在中学或大学里。”

“演过，在大学里。我们有个业余剧团。”

“您演过哪些角色？”

“嗯……演过塔尼娅，阿尔布佐夫话剧里的塔尼娅。”

“明白啦。一句话，演的也是正派姑娘。”

“是的，一般是这样。”

“您记得萨伦斯基的《女鼓手》吗？”上校又问。

“当然记得。我们也排过那出戏。我演尼拉·斯尼日科。”

“演得怎么样？”

“似乎不坏。导演认为，那是我演的最成功的角色。”

“不错，很好，甚至可以说非常好。请您多想想您扮演的那个角色的行为举止，尤其是她在第一幕中的表现。”

此时我才悟出了一点门道。

“这个角色对您会有用处的。一定会派上用场。怎么样，鲍里斯·鲍里索维奇？”上校转身问道。“她还是演员呢！”

他开了个玩笑，这玩笑是善意的。我的担心转瞬消失得无影无踪。鲍里斯·鲍里索维奇冲我笑笑，仿佛在说：“您瞧，怎么样？您还提心吊胆呢！”

上校伸出一个手指说：“您不要以为，舞台上那点成就，立刻就会消除您将要执行的任务中的一切困难。那些成就只不过有助于您做出最佳选择。”

说着，上校又坐回桌前。

“现在就来谈谈我们掌握的那点情况吧，看看如何帮您进入角色。”

我的记忆力很好，因此无需作笔记。看来普霍季科上校对此很满意。

上校最后说：

“请务必为我们找到某种依据，哪怕是一个小小的事实，以便开始调查。”

四

我很快便找到了位于纳雷姆斯克大街的那座楼房。

这是一座钢筋水泥结构的五层大楼，玫瑰红色，火柴盒式样。楼前长着四棵钻天大白杨；它们和建筑工人遭遇之后能保留至今也是奇迹。其中一棵显然是被吊车的铁臂削去了树冠，而另一棵则被剥去树皮；但是，两棵大杨树伤愈后不记旧怨，再现蓬勃生机，发出一树浓茂的绿叶。

我的新住宅房门大开。楼梯口电表箱前站着一位男人，身穿人造毛坎肩。他正从电表箱的玻璃门向里窥视，嘴里不住地唠叨：

“见鬼！装得真不是地方，横竖看不清！”

听到我的脚步声，他回过脸来，接着往旁边挪了挪，想给我让路。

我在他身后停住了。

一望便知：这是我未来的邻居彼得·伊万诺维奇·普里霍季科上校已经向我作过介绍：他是位军事记者，业已退休，孤身一人，但仍然在青年报社担任顾问。他对我来本市的使命一无所知。

“让我帮您瞧瞧。”说着我走了上去。

我知道他在前线负过伤，只见他微跛着右足向一旁退去。从楼道窗口透进来的光确实异常微弱，不过我还是读出了电

表上的标数。

“谢谢！”他连声道谢。

他的脸上布满深深的皱纹，两道苍白的浓眉，一双天真无邪的大眼睛。我没有走开。他迟疑地望了望我，尔后微微一笑。

“您好，叶夫根尼娅·谢尔盖耶夫娜！”

“您好。也许我不是人家告诉您的那位叶夫根尼娅·谢尔盖耶夫娜呢？比方说，我可能是家用电器检查员，或者是维修工，来看看什么地方出了毛病。”

“家用电器检查员我认识。至于说维修工吗——您这模样可不象。”

没法子，看来普里霍季科上校的担心不无道理。

“您瞧瞧，我把您堵在大门外了，”彼得·伊万诺维奇突然记起，“快请进吧！”

窄长的门廊里有两个房间的门，很显然，其中一个就是我的房间。彼得·伊万诺维奇作了自我介绍，几乎是一字不差地重述了普里霍季科上校对我谈的有关他的情况。

“房管委员会给我来过电话了，”彼得·伊万诺维奇说。“那么说，从前住在这个房间的谢廖沙·扎哈罗夫是您的亲戚喽？”

“远亲。”我说。

和普里霍季科上校谈话之前，我对谢廖沙·扎哈罗夫毫无所知。他是个年轻的地质学家，要到楚科奇半岛去半年。上校不愿让我住旅馆；而在人满为患的新西伯利亚市顺利地找到一套住宅，自然是出人意外的事。为了向周围的人做出合理的解释，上校只好给我认了这门“远亲”。

向一个好心人撒谎，心里总是不踏实，尽管这样做完全出于特殊情况的需要。然而，我就象剧院的演员，已经进入自己的角色，就必须照着戏文演下去。这出戏的导演便是普里霍季科上校。从今以后，对任何人来说，我都将是劳动手册上记载的那个人物——商品计价员，来此是为了找到对口的工作，当然要进商贸系统。最好是进新西伯利亚市商业局系统。是的，市商业局。

彼得·伊万诺维奇并没有好奇地盘问我，使我幸免了进一步撒谎。他打开房门对我说：

“这就是您的房间。我随便给您准备了点东西，也不知道您有什么，缺什么。说不定您应有尽有呢。不过，我还是给您拿来一套内衣——以防万一嘛。瞧，就放在床上，上面有条毛巾，都是刚洗过的。房间还是谢廖沙布置的老样子，我只是把床头柜换了个地方。”

“太谢谢您啦！”

“客气啥，愿您称心。”

他跛着腿走了出去，随手关好房门。

我环顾着四周。

床上盖着毛毯，整整齐齐一叠内衣，枕头垫布上印着几朵大花。窗前放着一头沉的小型写字台，桌面擦痕斑斑，显然使用年代已久。屋里放着两把木椅，屋角里竖着衣柜。床头柜上塑料托盘里摆着一只盛水的玻璃瓶，当然也是为人周到的彼得·伊万诺维奇事先灌好的。墙上挂着一本撕页日历。

尽管当时已经是九月，日历却依然停留在“八月五日”。很明显，谢廖沙·扎哈罗夫正是在这一天去往楚科奇的……也